

戴季陶先生與中山大學

(續完) 鍾貢獻

禁毛毛雨靡靡之音

中山大學文科在廣東大學時期，郭沫若尚沒有去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那裏做宣傳科長以前，他曾擔任過文科學長（相當於以後的系主任和院長），於是創造社的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王獨清等人都進到中大。他們分授文學概論、小說、戲劇之類的課程。十五年北伐時，又一窩蜂似的走了。二十七年政府遷至武漢，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部長陳誠，副部長周恩來，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這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我因共黨宣傳機關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定三月一日出版，二月廿七日奉兼衛戍總司令陳誠急電由粵調漢主持新聞檢查工作，也就是奉命和新華日報的直接鬥爭。郭知我出身中大文科，某次記者會後，他和我大談師生之誼。我說：那時我是預科學生，還沒有資格聽你的課呢！

中山大學委員會續聘的文科老教授，有徐信符、吳康、古公愚諸先生。國外歸來和他處聘來的新教授有周樹人（魯迅）、傅斯年、楊振聲、劉奇峯、莊澤宣、許德珩、丁山、顧頡剛、羅膺中、羅常培、汪敬熙、伍佩儀、吳復安、沈剛伯諸先生。

魯迅是由廈門大學來的，離開北京也不太久。他在廈大因反對創辦人胡文虎而被迫離開，帶了十幾位廈大同學來轉學。（在臺灣嘉義工廠任

教而數年前逝世，和我同屆教育系的谷中龍兄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位中文系的讀一學期又因魯迅離開而轉學他去了。）魯迅擔任教務主任（那時不稱教務長）兼中文系主任，開「文學概論」「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三課。前者以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中譯本做教材，選修的有兩百多人，其他科系亦有慕名而選修的，西堂沒有這樣大的教室，只好晚間在大禮堂上課。他第一次登上大禮堂講臺，很得意的說：我能够站在孫中山先生講演三民主義的地方來講課，是深感榮幸的！說到自己的學歷，去日本留學之前是學天文，以後改學地質，兩樣都不成才來搞文學，是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茫茫兩頭都落空」。大禮堂那時還沒擴音設備，他的嗓門很低，滿口紹興官話。講課時完全是紹興師爺派頭，慢吞吞的，又不照着教材講，廣東同學莫名其土地堂，只好紛紛打退堂鼓，剩下文學系幾十個必修的同學了。十六年三月底清黨前，不知是因為聽課的人數少；還是奉了左翼文壇的指示，他以不願和顧頡剛同校授課的理由，突然辭職帶着那時尙是助教名義而早已在大沙頭車站對面洋樓和他同居的「愛人」許廣平去上海了。

傅斯年（孟真）師十五年冬回國來校，擔任文科主任，魯迅去後兼中文系主任，（胡頌平兄的朱駟先年譜十七頁：「先生請傅斯年為文科學長，一實際等於文學院長」這名稱是不確的。十三年稱學長，十五年改稱主任，二十年以後

才是文學院長。）十七年語言歷史研究所成立又兼所長。十八年下期離校，由劉奇峯師繼任文科主任，羅膺中師任中文系主任。十九年我們第四屆的畢業證書到九月發給，是朱駟先年譜第九頁，文科主任劉奇峯副署，實則六月間畢業典禮時，尙是正副校長時代。又胡著朱駟先年譜第九頁，「以翁之龍為醫科主任」。可見當時不是「學長」「院長」之稱的。孟真師博學多才，開的課很多，而且不限於中文系的。我記得有「中國文學史」、「尙書」等五課。黃純仁兄說：他十七年升文科後，選過傅的中國文學史、尙書、陶淵明詩等課，傅孟真師說：尙書除盤庚康誥等二三篇外，其餘他都可背誦。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的寫，並沒有尙書在手裏的。文學史沒有課本，以後才補發他自己寫鋼板的油印講義，以臘紙起草稿，即付油印，常有塗改很多的地方。孟真師上堂不帶書，只帶幾枝粉筆，登臺後就坐在籐椅上，滔滔不絕地講，講得很快，無法筆記；純仁兄說，只有靜靜的聽，下課後背出來再記下。傅隨着與之所至寫黑板，常常不管下課鐘聲的。

顧頡剛的「上古史」是用自著的「古史辨」做教材，那時只出第一冊，一冊後就是發給我們的油印講義了。他也是從廈門大學來的，比魯迅遲來幾個月。在廈大他們鬧得不愉快，所以願來周去。「古史辨」有疑夏禹並無其人，而只是一條昆蟲的說法，我在校內刊物和在民國日報「雷雨」週刊（和農科程兆熊兄二人辦的。）為文

辯駁其非是。期考論文，我對這點提出幾千字的研究意見，惹起顧師不快！他擬給以零分，還是別的老師勸他何必意氣用事，給六十分及格分數吧！可是戴校長季陶先生却支持我的論據，他曾正式函請教育部：對於中小學教科書視為不當之甚，應予取締者，如顧頡剛之本國史，古代部



民國廿七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戴季陶先生（右二）與王寵惠（右一）孫科（右三）等先生合影。

份竟疑夏禹為無其人，未免乖異，不應作為中學課本。如呂思勉之本國史，竟左祖秦檜，而黜岳飛，顯違民族教育意義。如黎錦暉之毛毛雨，純為靡靡之音，而非正聲，這三種均應禁止的。

尊重學者研究工作

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十七年三月成立，由顧頡剛、鍾敬文、容肇祖諸先生主持，可是祇有三個年頭的壽命，在十九年四月便停頓下來。筆者忝為會員之一，學會在短短三年之中，刊行「民俗週刊」一百一十期，更出版了三十四種叢書，這正是我讀文科的時候，可是學會為什麼停滯下來？我怎樣也想不出原因來。「民俗週刊」有不少珍貴的資料和論著，我也時常寫點東西在上面發表。那時期我除與程兆熊兄主編「雷雨」週刊外，又在辛樹幟、康辛元兩師指導下創辦「湘聲」月刊。我是學生會的宣傳部長，「中大學生」是我主編的。寫的文章固然沒有存稿，這些印好的刊物都沒有存留一份，只是黃純仁兄還記得我的筆名「金工」而已。「民俗叢書」大都是四十年前實地調查報告，也是各地民間信仰行為的紀錄。是研究近代中國社會、羣衆心理和精研中國民俗學、民族學、文化史、社會史的最好資料。這些期刊的出版，直接間接都受到戴季陶先生的支持鼓勵和獎助。

季陶先生在「對於中山大學的希望」演詞內說：

「在民族的經驗上，文科的學問，常常是『能作』的基礎，而在『所以』方面，理科的學問，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在一個綜合大學裏，為各科的領導者，文科而外，當然要算理科了。但是我覺得這一科的困難，却比文科要輕得多。因為理科的學問，常常是世界的，人類的情，和文科的學問，許多是民族的，歷史的，情形大不相同。我們如果感覺人才缺乏的時候，只要是財力所許

，人才和材料，都可求之於世界。並且除了發明的能力以外，我們可以確定在若干年中，培養出相當的理科人才。這一點比起文科來，似乎有把握得多。從前理科各系，本有相當的設備，半年以來，增加的材料和設備，很可以使我們確信今後理科的建設，必然有順利的發展。現在學校正在設計中的天文臺，動植物園，和政府合辦的兩廣地質研究所，都是理科前途的新光明。今後只要行政和事實許可，理科各系，我們都可以加聘世界有學問有經驗的專家，也可以設計大規模的研究所。

「在醫科方面，我們較為可以放心的，就是幾個重要講座，都住着適宜的德國教授，新設備的細菌學，病理學，生理學，解剖學，四個重要研究所，在短期裏，已經能够表現出很多的成績。而且幾個主任教授，每天從早到晚，很熱心地在研究室工作，這種情形，是頗足令我們安慰的。只要教授們肯這樣實際去做，幾年之後，累積起來的研究成績，便成為中國醫學界的新基礎。不單本大學的醫科可以鞏固，在行政上，在社會上，都可以得着很大的幫助，中國人民生活也可望得到改良的。附屬醫院的內容，較之去年委員會接手的時候，也整理得許多。關於醫科情形，使我有個很大的感觸，就是幾個德國教授，他們不是中國的社會組成份子，和政治社會，沒有連帶關係，沒有政治上的風波去牽動他們，影響他們，沒有社會的不良風習去引誘他們，逼害他們。在學校所定的嚴格合同約束下，他們絕對不能到外面去兼差，不能到外面去行醫。大學的職務，是他的事業，同時也就成了他的趣味。用心既專一，時間又充分，自然他們在學問上的成績，可以希望特別不同。為中國學術和教授的前途計，我十分希望中國的教授們，也忍耐着一些心理的痛苦，把一切擾亂他們研究學問的心思和關係丟開，很單純地為學問而研究學問。也希望社會的

人們，大家要尊重學者的研究工作，不要拿不相干的問題，牽動教授們研究的情緒。要發展專門的學問，必須要靠專門的人才。而要造成專門的人才，必定要能够專心致志去做研究的工作。爲別的關係分心，斷斷乎研究不了學問，這一層是要校內校外的人們，大家體諒的。

「中大的農科，本來學生不多，設備不足，規模不大。以後要求確實的進步，非大加擴充，大加改造不可。自從今年春天以來，農科的教授們，在不言不語當中，也作了不少的新計劃，一件一件地在進行。對於地方的農業改良，農務行政的建設，也不斷地幫助着做種種工作。農場的開發，在這半年多當中，成績也大有可觀。近郊的第三農場，我們希望在三年之後，成爲廣東的唯一農事試驗場，並且成爲省城附近第一風景優美的區域。」

「我們大學裏面一個頂麻煩困難的問題，就是法科的問題。因爲現在是革命時期，無論什麼人都帶三分政治狂，革命狂，有能力有學問的人，都拉到政治方面去了，於是大學便生出求才難。學生也到外面兼差，美其名說是爲黨工作。我們是國立大學，和黨立大學差不多，所以求人才的艱難倍上加倍。學生的科學基礎太差，程度不齊。加上完全沒有研究的設備和組織，這些都是法科困難的所在。至於法科的發展計劃，大體是下列幾項：(一)趕緊擴充法科所必需的書籍，搜羅各種研究資料。(二)先辦三個頂重要的研究所，是法律研究所，政治研究所，經濟研究所。(三)廢除預先印發講義制度，只由各教授編出一種講義案，分交各學生，各學生應該要自己作講義的筆記。(四)法科分作大學和專門兩部，大學部比專門部多一年。(五)專門部中添設一個移民科，養成移民的領袖人材。」

兩位元老輪流長校

民國十六年春，江浙及豫鄂各大學均有改名中山大學之事，季陶先生以廣東大學係 國父所手創，又爲生前講演三民主義之聖地，應視爲全國統一之中山大學以紀念國父，特請改名爲唯一之國立中山大學，呈由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定名爲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而武漢稱第二，河南稱第三，南京稱第四。但是沒有幾個月，又復取消「第一」字樣，並將武漢、河南、南京三間中山大學另改名稱了。於此足徵季陶先生對校名之重視，謹守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的古訓，造次顛沛未嘗時刻或忘的。

十六年夏，季陶先生返粵接任改制後的校長職務，行前張靜江先生等都泥其行，因爲寧漢滬合作後，設立中央特別委員會，三方各提六人，又公推十四人，共三十二人爲委員，季陶先生是委員之一。國民政府改組，他仍任國府委員。僉以京滬重要，中樞任務繁多，不宜赴粵爲言。季陶先生亦知留滬非無意義，祇以辦學重要，由於對學校前途的樂觀，更偕眷屬同行。不料秋間張發奎，黃琪翔到了廣州，引起左翼份子蠢蠢欲動。李濟深主席離粵，政局更覺動盪不安，學校內時常發現奇離（擁護汪精衛的）標語。有一天晚上，季陶先生從廣州政治分會得一個消息，氣憤之下，要立刻離開廣州，並提出辭職。朱駱先師送季陶到香港，當時廣州政治分會知道此事，派人趕到香港，季陶已經起程赴滬了。駱師返穗後，政治分會又請其赴滬勸駕，經多方解說，季陶同行南返。不料十一月十七日到廣州那天晚上，張黃之變發生了。第二天早晨才得到消息，午後他們請兩師參加會議，季陶堅決要離開。他說這是共黨的陰謀，不應坐困危城，爲其利用。並勸朱駱先同行。因清黨後，朱駱先亦任廣州政治分會委員，及清黨委員會委員，當然也不便留在那裏的。於是他們兩人匆匆離開學校，把校務交給事務主任沈鵬飛教授代行。

張黃事變後，不到一月，十二月十二日，就發生廣州共黨暴動，據城三日，殺人如麻，滿街滿巷都是死屍。事變平息以後，因中央早已發表朱駱先先生爲浙江民政廳長，在屢催之下，不得不去接事。不久國民政府五院成立，季陶先生被任爲考試院院長。請辭未獲邀准，只得離開中大就任新職，在心裏却是十分勉強的，季陶先生的志願在專心辦學，事與願違，有時和人談起，甚至痛苦流涕。他既無法離京，駱先先生又不能離浙，一再堅決向教育部和內政部分別請辭，又未獲准。結果，兩位就以換班方法，輪流來校，朱比戴在校之時爲多。兩人都不在校時，校務由沈鵬飛教授代行。

學生重視邊疆教育

十七年五月，大學院召集全國第一次教育會議於首都，中山大學與兩廣教育廳共同提出「確定三民主義之國民教育以救國家之危亡案」，嶺南大學亦附名連署。戴、朱兩先生及教育系主任莊澤宣出席，廣東教育廳許崇清廳長，廣西教育廳長黃華表，均委婉陳詞，堅決主張。雖結果僅獲修正通過，惟嗣後關於國民教育的見解，漸集中於復興民族之一義，和教育宗旨的確訂，都肇基於是次會議。

季陶先生就任委員長的時候，早有要在學校建立東方民族院的志願。當時，季陶先生以前任四川省長，駐西康之川軍總司令劉禹九（成勳）爲四川大邑人，辛亥革命即曾相識，故託劉代招康藏籍學生來粵，食宿雜費，全由政府負擔。季陶先生此舉，原以康藏情況不甚明瞭，試探性質，不作可能實現希望的。不期劉禹九竟熱心相助，第一期學生，迅即到達南京。季陶先生乃變更計劃，建議在中央黨務學校附設邊疆訓練班，（以後改爲附設蒙藏學校）招收入學。是爲邊疆學生就學中央的開始，以後西康、西藏、青海、

新疆等處有志青年，聞風向義，負笈來京者，絡繹不絕於途，更是始料所不及的。季陶先生在十六年中央黨務學校成立之初，奉命任籌備委員，總統蔣公任校長，季陶先生又任教務主任，羅家倫副之。

十八年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曾通過確定總理遺教五種，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早根本法案，並確定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案。其中第二案的宗旨，在確定中華民國的教育，要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上提案係季陶先生親自起草，由中央常會提出於大會，因為內容都是季陶先生一貫的主張，而迭次在校向同學講述的。代表大會於討論此案時，季陶先生並向大會詳加說明，案經大會通過後，黨內靡雜的言論，始得定於一尊。晚近偏激之教育，始得衷於一是了。

文化科學向北灌輸

民十八年是季陶先生在京最忙的一年，到十九年一月，考試院與所屬部會正式成立，季陶先生宣誓就職後，一月十四日就請假返粵料理中山大學校務，二月初由粵返京。一月至二月正在寒假期中，他以久未返回學校，心裏常常感覺到抱歉。於是約集各部門負責人，迭次會議規定各種新的建設計劃和方案，特聘教授也有些沒有會過面的，分別邀約晤談。又特別約集法科全體教職員及文科主任等來討論法科的問題，有一篇中山大學法科的建設講詞。他先說到委員會成立之初，有「醫科待醫」「法科無法」的說法，經過逐漸整理，待醫之醫科，已經醫到將要出院，無法之法科，比較從前已經漸漸有法了。中大整個有進步，也是國家社會漸上軌道的一個現象。他又

說自己二十年前是學法律的，但覺得辦法科是很難的。關於法科建設方針，想和文科溝通，因為法律、政治、經濟三種學問，有兩個要素，就是歷史和地理，尤其是歷史最難。所以想把文科和法科的研究所打通，法科不能單獨做的研究工作，由文科來幫助。所以法科的發展，一定希望文科幫助法科的研究。季陶先生最後歸納三點意見，希望教授們研究一個具體的辦法。

(一)學系課程的問題，最好三學系課目的本身，要以歷史為綱領，以實際為歸束。

(二)法科今後建設的問題，就是各科目的研究，應如何研究？這一點，以為在各教授擔任科目的範圍內，研究該科應當注意的事實與問題的歷史，切實研究。最好設法強制學生幫助該教授共同研究。

(三)文法兩科在研究工作上，想如何打通的辦法。

季陶先生在十九年一月下旬，向全校師生有數次兩三小時的訓話，雖在放假期間，而大禮堂外的甬道都站滿了人，因為新同學有很多沒見過校長的。他首先申述這樣長久時間沒有返校的原因，繼將國內外的情勢，作詳盡的報告和分析。就政治和軍事上看，已算由混亂進到安定時期。從軍事進到訓政時期，從破壞進到建設時期。教育方面，已經有了三民主義做我們的中心思想，有三民主義做我們的原動力。復次從國際情形看，總要我們努力自強起來，我們的國際地位，也可以會增高。現在救中國，惟有實際建設，而教育事業，尤為一切建設工作的根本基礎。希望全校的同事同學，共同奮起，共同負擔這個責任。

至於中山大學在中國處於什麼地位所負的是什麼責任呢？他說最近幾年來，本大學已把很糟很亂的思想，挽回過來了。這三年當中，我們把許多走入歧路的青年，頹喪的青年，挽救過來，走到一條新的道路，這算是本大學最大的貢獻。好

像在一片荆棘的亂山當中，打出一條平坦的大路，不過只把迷夢的青年救了過來，在積極方面中還沒有多大的建設。最近我們中山大學，比三年前要充實得多了。如生物學系的材料，比較從前着實多了一百倍還不止。其他各科，無形中的進步，也不知是多少。今後我們要加倍的努力，拼命去做充實實力的工作。從過去說，在困難當中，在九死一生中，已經在消極方面覺醒不少青年，如果中山大學不去做這種工作，恐怕中國的青年，不知還要犧牲多少。那麼今後在積極的方面做工作，更應加倍的努力，要造成更大的成績，才不負我們的使命。我們就本大學的歷史來說，是總理手創的，是紀念總理孫先生的唯一學府。從本大學的地位來說，是站在全國南北中三個大學中間的南方唯一的大學。我們的同學，要把這一個地位認識清楚。這一百多年來，中國的革命潮流，是從南方推移到北方，也是中國民族的一個大翻身。現在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把文化和科學，從廣東向北方灌輸，從珠江流域到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由甘陝向新疆推進，由新疆一直推到西伯利亞，由西伯利亞貫通歐亞兩陸，進而推行到全世界。這些文化科學的種子，從什麼地方來呢？就要先把我們中山大學弄好，我們中山大學要能負擔發揚文化科學的材料，中大要做文化科學種子的栽植和培養的地方。我們要曉得，黃河流域的錦繡山河，所以會變成現在的一片荒土，純然是由野蠻的種族日夜洗刷，日夜侵掠弄得這樣糟糕，這是多麼痛心呢！現在正是我們努力復興文明，再造文化的時期了，我們應該如何負擔起這個歷史的任務和歷史的使命。

救國救世醫身醫心

季陶先生又說：「總理孫先生為中國革命前途打算，下了絕大的決心，辦了兩所學校。一個是黃埔軍官學校，一個就是本校（中山大學）。

黃埔軍校的學生，在蔣先生指導之下，這四年從南方統一廣東起，一直進到統一全國，實在是幹了很大的不朽功績。至於說到中山大學同時所負的責任，並不是軍事時期的責任，而是擔任建設時期的工作，這種工作，尤其更重要。我們要曉得自從民國八九年到現在，十多年來一般青年走入迷途拼命犧牲的，不知多少，這都是朱執信先生所說的無代價的犧牲，實在是可惜得很。本來世界上是沒有壞人的，而知識確有高下，認識確有正謬，這許多被犧牲的青年，就是認識不清，做事隨便。他們把天下的事情，看得太容易，太隨便，所以一直走到錯誤的道路上去了。從今以後，我們的思想界，總算經過十年的狂風暴雨，總可定一定，最害怕在這個革命期間，當狂風暴雨之夕，又懶惰起來，這就不可救藥了。今後我們中山大學，一定要負起努力發揚文化與促成建設的任務，事事要求國家基礎的充實。我們如果把中山大學辦得好，中山大學的基礎穩固，那就是國家新基礎的發動點，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基本力量。這一個新基礎的發動，這個基本的力量，就要本校全體同學和同事大家同心同德一齊起來，共同負擔起這一個責任。」

民國十九年初，醫科附屬醫院，頒佈一個護士服務條例，以加強對病患的服務。護士們對於這個新條例，尚有不明白的地方，因為從前是沒有這種辦法的。季陶先生於二月三日快要離粵返京前夕，在百忙中擺脫一切去向護士講話，說明救傷救病，是人類中一種必要的道德，同時是人類生存上最大的一個需要，季陶先生在醫院門口，寫有一副對聯，是「救人救國救世，醫病醫身醫心」，這副對聯說明了醫院的功用，及從事於醫藥看護的人的職務和道德標準，希望大家觸目驚心。把這兩句話，當成一個格言，一個教育標語來看，時時刻刻，用這兩句話來陶融各自的身心，指導各自的工作。特別是護士的職業，

小之關係個人生命和健康，大之關係種族的強弱存亡。古人說，「醫乃仁術」，又說「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就是這個道理。

新校舍的建設計劃

中山大學石牌宏偉的校舍，是鄒校長海濱先生於民國廿一年返校後建設的。但是戴校長任委員長時期，民國十六年初就已提出校舍的問題，他說：

「校舍問題，幾乎是我們本校目前更大的難關。這半年當中，我們爲了這個問題，不曉得費過多少心思，勞了多少精神，現在仍舊沒有安心順意的解決方法，因爲第一，我們學校的地面是在繁華的城市當中，沒有法子可以擴張地面。第二，從前的建築不是很適用，而且缺乏得太多，又是超過了保險年齡的舊房子。兼之廣東特殊的潮濕天氣和白蟻那兩個敵人，已經把所有的房舍，都破壞得很利害了。第三，從前的學生都是住校寄宿，照現在校舍的狀況，專用來做學校用，尚且差得很利害，那裏容得學生寄宿呢！第四，我們替教職員着想，許多遠道來的辦事人員，要學生們安心求學，並不是沒有請他們住校的必要。在理想上，將來要造一個大學市，把教職員、學生、工人們的住所問題，由學校規畫出很好的設備來才好。而且廣州本是一個人口稠密的都市，現在市內住所困難的問題，已經是明明現了出來。華僑學生們，不遠萬里回祖國求學，人地生疏，我們對於他們住所問題，更要打算。將來學校有了建設大學市大學村的能力，把學校移向郊外發展。」

十八年多爲了校舍朽壞，戴先生特向中央滙陳學校困難情形：「一曰求材之不易，因中大俸給較任何大學爲低，遠者不欲來，來者不久住。昔時北方紛擾，人材避地，尚易徵聘，統一後各校恢復原狀，爭相延攬，已聘者藉故不來，到校

者託辭而去。二曰建設之缺乏，三年來設備費七十餘萬，悉由經常費中騰挪而來。三曰經費之支細，月僅九萬毫洋，合大洋七萬二千元，較之他校，相去懸殊。」

「四曰校舍之朽隘也。中大校舍，爲高等師範之舊址，狹隘陳舊，不敷應用。且建築盡屬木料，早爲白蟻所蛀，年久日深，倒塌堪虞。農科及附中兩校舍，其建築之陳舊，白蟻之蛀蝕，與校本部同。至醫科爲公醫院之後身，建築雖佳，仍不敷用。傳賢任事以來，昕夕籌維，對於文理各科，正在積極籌備，深慮以房屋之故，牽動全局。對於醫科，則以總理一生事業，發軔於醫。對於農科，則以總理革命機關，始於農學，最先著作，詳於農政之書。中大爲紀念總理學府，尤宜特別重視。總理所注意之醫農科，以爲永久紀念。故亟思改建新校，以避免危險，擴充內容，以圖發展。詎意時艱費絀，心與力違，三年以來，僅能東修西葺，聊維現狀。本擬乘今年暑假，籌備詎款，大加修理，乃值國家多事之秋，編遣實施之會，國帑支絀，未敢陳情。不圖隱忍因循，鑄成大錯。月前接校中電告，理科生物學系研究所，竟成倒塌之災，損毀儀器標本數千件，實爲最重大之損失。近兩年來，理科注意實際工作，日有進步。以生物學言，曾組織採集隊三次，遠出採集，所得標本，爲數甚多。不特於中國生物學界中，有巨大貢獻，即各國生物學界，亦表示欽佩之忱，具有莫大之希望。遭此損失，成績蕩然。傳賢忝主校務，責有攸歸，聞電震驚，莫名慄悚。往者已矣，來日方長，試思文理法農各科，及預科附中各處員生數千人，悉坐於危崖之間，垂堂之下，每一念及，寢饋難安。若不亟圖根本建設之方，萬一危險再生，何以對國家，何以謝人民。是以再四思維，不能不爲我中央垂涕而道，……。」

「關於校舍之問題，中大校舍之朽舊，已如

前述，除附小校舍係屬新建，且當年捐款之馮先生平山，猶肯繼續捐款八萬元，以資擴充，較有相當籌劃外。其他各處，均須有徹底之建設。校本部文理法各科及附中部分之時處倒坍者，固宜另建校舍。即醫農兩科，亦有新建之必要。蓋醫科除生理、病理、細菌、解剖四研究所外，藥物學研究所，亦在籌備之中。而理科之心理研究所，因學術上有聯絡之必要，現亦附設於醫科之內，房舍久感不敷。農科雖前年新建一棟，規模仍形狹小。此兩科於紀念總理之關係，已如前陳，自當新建校舍，始足以宏施設。此種根本建設，從前已有兩次大計劃。其一，民十五年，傳賢曾一面呈中央撥建築費一百萬元，一面親赴海外向華僑募捐一百萬元，合成二百萬元，足為新建設之費。其二，上半年在廣州政治分會通過兩案：(甲)決定由國庫先撥一百萬元，上年七月份起，分六個月籌足，以為建築費用。(乙)決定民國十九年國慶日，在粵開農展覽會。經費由省庫提撥二百萬元，其地址為中大第二農場。博覽會所用之房屋，以一部份為永久之建築，閉會後，即撥為中大校舍。以上兩次計劃，均以軍事政治上之關係，至今未能實現，言之可慨。查中大第二農場，在石牌沙河之間，舊要壘砲台之地，總面積約一萬餘畝。已開墾種植者約十分之八，道路和公共設施，亦已粗具規模。附近可擴充之荒地，不下數萬畝，如石牌聚龍岡等處。其地山環水抱，廣州四面山水，都像衛星似的圍繞着，如拱北辰，為廣州形勢極佳之地。如將此地建立大學，全國各大學校址，將無出其右。擬懇中央決定，關於中大新校舍之事，由國庫酌撥若干，由南方各省庫協助若干，再由中央選派有聲望之同志，或由傳賢自行向華僑勸募若干，三方進行，同時並舉，則中大根本建設，實非難事。……三請中央通過建築新校舍計劃，並請決定至遲自明年一月份起，至十二月份止，每月撥足十萬元，俾得

從事開工建築，中大幸甚！國家幸甚！再傳賢離校日久，亟思乘新學期開始之時，赴校料理一應事宜，期以一月，一俟料理完竣，仍回中央服務。

十九年一月，戴先生返校後，曾有新校舍建設的計劃講詞，要點是：

「本校新校舍的建設計劃，在三年前大學委員會就職時起，我們就從事計劃了。單就新校舍的圖樣來說，已經經過好幾個人的設計，曾經造過圖樣的，已經有兩個人。一個是已作古的呂彥直先生，一個是本校的德國海克教授。大家都知道本校新校舍的建設，是三年來，尤其是近兩年來，大家都很努力而且很多人在那裏費心思的一件事。……關於經費，由校董會擔負籌劃責任。中央已通過二百萬元，但是不夠的，不過用來做第一期的主要建築罷了。將來建築當中的要點，是以堅固實用為主要，而不採用華麗的材料。在這個要點之下，我們也想建築幾座宏偉的建築物，如大禮堂、圖書館及博物館。……以後本校不斷的物質建設，都在同學身上，所以想到新校舍的建設，就要輪到各位同學身上。今後大家要一心一德做 總理的信徒，一定要做基本的建設工作。我們怎樣可以做 總理的忠實信徒呢？就是要學 總理天下為公的精神，盡自己的職責，做一個忠於學問的人，把終身都貢獻給學問，決意為三民主義努力。如果我們同學都具備了這種精神和意志，那麼本校的整個建設計劃，一定很容易成功的。」

念茲在茲不忘中央

十九年秋，朱校長驢先辭去浙江省政府民政廳長職務。戴校長季陶就預備把學校校務正式交朱接替，取消副校長制。且早已建議中央設立董事會，並自願擔任董事長。中央以戴先生主持考試院無法離京，而對學校特別重視，照他自

己志願，寧可不擔任中央的職務，而專心辦學，季陶先生一生事業，方面雖多，但是對中山大學則是時時刻刻，念茲在茲的。中央接受他的建議，在十九年九月發表命令，成立董事會，戴先生擔任董事長，另請蔣中正、胡漢民、譚延闓、宋子文、古應芬、孫科、陳銘樞、朱家驊為董事，明令以朱家驊兼任校長。國立大學之設董事會，這是一個創舉。戴先生所以有此建議，而且自願擔任董事長，正是表示對中山大學的關切。這樣，他雖離去校長職務，但是在精神上，還是領導着中山大學的。

戴先生在中山大學委員會委員長及校長任內，正是承學校業務紊亂，學風敗壞之餘。十五年初到學校，就從事徹底整頓，對原有一切規章，都全部加以厘訂。原有各科學生，一律停課覆試，分別去取。原有教職員，一律解聘，另候任用。幾等於從新締造，而困難且尤過之。學校當時經費，每月初初只有毫洋九萬元，尚須配搭債券，等於折扣。經大事整飭，決定事業費用須佔半數，並盡力節省其他一切雜支。在極短期內，財政便上了軌道。十九年每月經費增加至十四萬元，事業費應佔半數的標準，始終維持不變，所以能够把各科設備加以充實。例如圖書館接辦時只有中文書籍四萬餘冊，西文書籍三千餘冊。離職時中文書籍增至二十一萬多冊，西文書籍增至四萬餘冊。各種中西文學術刊物，計有五百餘種。而英國皇家植物學會報最為知名，尋常市價號稱值五萬美金者，乃係以孫山採集動植物一套交換而來。因為這項採集標本，只羊齒類即在二千五百種以上，一時名震世界。他如各種儀器的增加數量，其比例也和圖書相差無幾。醫科附屬的兩個醫院，更已大為擴充改善。此外農科開闢的荒山荒地，有兩萬五千餘畝，其中一萬七千餘畝在白雲山，創辦白雲山林場。八千餘畝在石牌，即擬作為新校舍的建築地址，內林區亦有五千畝

以上。又常派遣地質生物專家，分赴各地調查採集，並計劃在西昌設立生物地質研究機關，惜因離校而康昌滇崖以及西北東北等調查隊都沒有繼續出發了。戴先生又認為擬辦而未辦的有兩件大事，一為請政府特別撥款及向海外募捐建設新校舍。一為設立東方民族院與移民科，都未依照實行。引為遺憾！

戴先生離開校長職務，而時刻不忘中大，念茲在茲，四年後的民國二十三年一月，接獲鄒校長函告石碑新校舍建設完成，欣喜之餘，亟覆書道賀。內有「弟自來所憂者，惟在無人繼續完此工程。今得創立者回校任事，豈不大快。即無一字之囑，早晚禮佛時，亦未嘗不求其圓滿成就也。」並以當年總理手創文武兩校，而大學尙未建設成功，得鄒先生回校，行見全國第一之大

學基礎，必得成就云云。

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聖誕節（國父誕辰日）清晨六點，戴先生率領在京師生兩百餘人，在總理陵敬獻孝經鼎，親撰之祝詞有云：「日月云逝，同學等奉命擔任他職，或以修業終了，先後離校。然而思慕母校，與信仰 總理崇高偉大仁慈之忱，則無時或已。……因念 總理培育之恩，不可不報，而孺慕之忱，亦不可不有所托，於是發起敬獻銅鼎一座於陵前。……雖物體輕微，而同學等信慕之忱，則不倦不轉。今逢 總理聖誕之節，謹集合在京同學，敬謁陵堂，至誠獻納。」

上述兩事，更是戴季陶先生身雖離校，而精神永遠在中大的具體證明。

× × × × × × × ×

李品仙回憶錄自序

李品仙

民國六十年辛亥，本人八十初度，曾將八十年來領軍從政，南征北討，種種經歷見聞撰為長文，印贈親友，無非雪泥鴻爪，鈞玄提要，姑且留下一點紀錄而已。事為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先生所知，承他親蒞舍下殷切為中外讀者請，要本人將這部八十年來的回憶公開發表，雲情高誼，至深感謝。於是又花費了不少時間，將全部紀錄增訂補充，完成了多達十餘萬言的懷舊憶往之作，題曰「戎馬生涯」。自民國六十二年九月起，在銷行廣大，無遠不屆的中外雜誌開始連載。縱使本人幼讀詩書，畢生頗好吟詠，但以中外雜誌讀者

之衆多，地位之崇高，確曾誠惶誠恐，心情相當的緊張。然而，也許是因為這部「戎馬生涯」寫時事有據，語語屬實，居然博得中外高明讀者的如潮好評，全書刊出未及其半，要求輯印單行本的讀者函電即已紛至沓來，使本人至感欣幸。中外讀者盛意拳拳，王成聖先生力請者再，本人又焉敢傲帶自珍，辜負王成聖先生與萬千讀者的一片盛情呢。乃重加整理一過，易名為「李品仙回憶錄」送請中外圖書社出版。此一個人真實記錄之終告問世，各方愛護督飭之切，本人特此在此敬至最誠摯之謝意。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
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
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
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
七七一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